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 (1901~1911)

杜慧敏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 (1901~1911)

杜慧敏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杜慧敏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2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第9辑)
ISBN 978-7-80678-858-5

I. 晚… II. 杜… III. 小说—通俗期刊—文学—翻译—
研究—中国—1901~1911 IV. I 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011 号

责任编辑 阙政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

杜慧敏 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mm 1/16

印张 33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58-5/I·155

定价 65.00 元

序

陈思和

杜慧敏的这部书稿在我的桌上已经放了好几个月，早就答应她为之写序，但总是有杂七杂八的事情穿插进来，抢到了她的前头。我做事一向是重远轻近，不太熟悉的人找上门来的事情总是要赶快做，否则一转身就忘记了；比较熟悉的人，或自己学生的事情则可以放一放，因为是互相了解的人，即便是怠慢了也不会怪罪，而自己的事情或者写作计划，总是无限期的拖下去，反正自己不会与自己过不去。这样一来，吃亏的还是那些与我比较熟悉的人，他们的要求，往往被我拖得很久才去做；不过，即使这样我也未曾有一刻忘记过，反而是时时揣在心里，不断提醒自己。杜慧敏这部书稿就是这样，我已经前后读了好几遍，每次被打断以后，捡拾起来又须重读，读来读去，对书中的内容失去了初读时的新鲜感，但每一遍的阅读，总还是有些新的收获。我对于翻译研究理论向来未曾留心过，只是我的几位朋友在研究此道并且果实累累，我多少受点影响。而以晚清文学翻译与传播为对象来印证翻译研究理论，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研究个案，所以我想就这部论著的出版，简单探讨一下目前翻译研究理论的一些流行观点，就教于作者与有关方家。

虽然翻译活动随着人类的交往扩大而早已存在,但对于翻译的研究,以往基本上是停留在翻译技术层面或者语言学的层面,而从译介学发展而来的翻译研究理论,在西方大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国内兴起的时间更加短暂,不会超过二十年。记得翻译学专家谢天振教授说过一句话值得玩味,他说,以前的比较文学是“欧洲中心论”,欧洲的学者都懂得三四门语言,他们把欧洲各国文化历史比来比去,并不需要翻译。只有当“欧洲中心论”破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走出了欧洲诸国的圈子,才需要仰仗翻译来沟通各国文化的多元性,这时候翻译研究才会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1]。在中国,翻译研究起先也是比较文学专业中的一个方向,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新起的翻译研究,标志了传统翻译研究偏重于技术讨论的阶段已经过时,转向了翻译理论本体(包括它的传播、接受以及文本等)的研究,随之,与“欧洲中心论”相应的“原著中心论”也遭到质疑,翻译研究理论转向了文化研究。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著中心论”为核心,其必然要围绕“原著如何被翻译”的技术命题而展开,追求那种最完美的乌托邦式的译本。而新起的翻译研究放弃了技术命题的探讨,那就必然把理论兴趣向外转,形成了文化研究。这似乎是当前我们翻译研究的新趋向。

而在中国,要寻找新起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典范的例子莫过于晚清的翻译活动。据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系统理论”的观点,一个民族文学系统处于“危机”或者“转折点”,甚至处于一个文学真空的阶段,“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得由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繁重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2]这个原理正好用来解释晚清的翻译活动为什么会如此兴盛。我们有许多学者常常以几部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史著作里设有翻译专章为例,来批评现在流行的现当代文

学史著作不重视翻译活动,不列翻译专章。我以为这是不明事理的批评。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要列翻译专章,就是当时的传统文学系统出了问题,亟需翻译文学来提供新的文学范式,包括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以写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史不能不专门介绍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在当时确实构成了中国新起的文学范式的一部分。然而“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范式已经建立起来,翻译文学作为新文学作家的知识资源和创作样板虽然依旧存在,但逐渐转移到具体的作家的个人创作背景中去,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组成部分。所以,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在讨论文学思潮运动时仍然会注意到翻译文学的存在,但不再将其看作独立的文学组成部分。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以为晚清时代翻译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以后各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类似的情况可能在 70 年代末又重现过一次,这还值得专家们研究论定。

杜慧敏娴熟于西方翻译研究理论,她选择了晚清文坛的翻译活动为对象,十分妥帖地使用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理论,使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达到浑然一体。她的研究题目很集中,其标题是:《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晚清、小说期刊、译作,三个词来限定“研究”的对象,又用“主要”来限定晚清小说期刊,所谓“主要”,就是以《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五种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再兼顾别种刊物。所以作者所设定的研究范围,综合起来就是一连串的自我设限:晚清(十年)、主要(五种)、小说(散文诗歌等除外)、期刊(单行本除外)上的译作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很具体很微观的题目,但比之那些漫无边际的“宏大叙事”来,我觉得这部论著更接近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态度。因为入口比较小,这部论著的理论开掘显得十分重要,它的优点和缺点也让人一目了然。

很显然,作者写作的目的并非仅在于检验理论功能,而是企图从

翻译研究入手,对翻译文本进行比较深入的细读,从而探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撞击。这本书的余论里,作者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论述后,进一步发挥说:“晚清小说期刊译作的功能也就不是体现在译介活动之后的传播、接受环节上,而是为中外文学和文化初次相遇后的相互协商、展开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域。”而“当译作文本的这层功能被揭示出来后,也就意味着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可以展现为不同层次。至少,我们可把中外文学文化在译作文本层面的相遇以及由此展开的复杂较量,纳入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个基础层面。这一层面所蕴含的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是微观的,但它是深刻的、根本性的,也是影响深远的。”作者行文受到眼下比较文学研究通行的繁琐风气的影响,读起来有些拗口,但其意思并不难理解,她研究晚清文学期刊译作的动机,并非要揭示其翻译过程中的动态现象(诸如影响源如何过渡到接受场),而是通过对译本的静态分析,来解释中外两种文化因素如何在译本中相交相抵,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杜慧敏在原书稿的正题上用了三个翻译研究理论的专用名词:文本译介、文化相遇和文学关系。其实这三个概念是翻译研究中同时产生的三层意义。什么叫文本译介?我的理解也就是作品的翻译。什么叫文化相遇?就是通过细读译作本身的各种元素,来了解翻译的规律和特点。作者自觉地把译作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把它视作“为中外文学和文化初次相遇后的相互协商、展开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域”,那么,分析译作文本也就如同清理战场,把两军对阵中遗留下来的种种战争痕迹都一一清理出来。“译作”的概念,包含了两种以上对立转化关系的元素——原文(包括重译本)元素与译文元素——杂糅混合的文本。要清理这些元素之间所构成的关系,只有通过认真的文本细读才能完成。因此,围绕这个目标,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从译入语、译入文体、译者身份、译介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晚清

译作的功能。其论述相当完整和专业,运用了大量的专业名词,甚至连“赞助人”这样典型的翻译研究领域的专业名词都被概括出来了。然而,这一切研究与阐释都将归之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从“文学关系”的大范畴里,界定翻译研究的特点和意义。杜慧敏对这一点似乎特别强调。她的学科意识很清楚,不赞成将翻译研究脱离比较文学的学科。所以她把自己对译作文本的考察视为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层面”。

我的看法是,杜慧敏从学科角度来界定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是对的,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能脱离翻译研究而存在。但是这里也需要有更加细密的界定,我不太了解翻译学领域的情况,其实杜慧敏所讨论的译作文本,仅仅是指文学文本的译作,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相遇、文学关系才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系统,但不是所有的翻译研究都体现出文学相遇和文学关系。在关于翻译研究的理论中破除“原著中心论”也同样是指文学翻译的范畴,不能引申到一切翻译领域,比如科学论文、商品说明等翻译工作,可能原著还是占据了“中心位置”。文学译作的文本自然可以被视为译入国的语言文学范式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在晚清译作中特别明显),但翻译的科学论文显然不能作为译入国的科学成果。因此,我不太了解这个国际的“翻译学”是仅仅指文学翻译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或者翻译学,理当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以外的范畴,即使是文学翻译,也仅限于对翻译作译介学意义上的研究,才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至于其他如翻译技术的问题,也很难与比较文学学科等同起来。准确地说,翻译学与比较文学,应该是有相切有相重的两个学科,这样可能是比较确切些的说法。

最后回到这部论著,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提出来说一下,那就是

这部论著的结构。可以说,这部论文是由两个部分所构成,一个部分是论文正文部分,基本上是根据翻译研究理论来演绎的晚清翻译研究;另一个部分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作者用附录形式制作的大量表格,介绍论文所论述的对象的背景资料,这里包括三种附表和两种附录,材料充足,自成一格,有了表格,才能腾出主要的篇幅进行理论探讨,正文部分不再作概论式的叙述,而是紧紧围绕翻译理论的一连串术语概念来展开。所以,应该把这种组合看作是论文的有机构成,附录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两者不可偏废。

时间过得很快,杜慧敏毕业后迈步走出复旦的大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不知不觉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她的论著能够获得资助出版,是其学术事业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她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在极其繁忙的教学任务之余,对书稿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希望杜慧敏把这部论著的出版视为万里长征的开端,在学术的道路上一步步坚实地走下去,真正的收获是属于那些敢登攀科学高峰的人的。

2007年10月30日于黑水斋

注 释

[1] 参见谢天振《译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这里我并没有引谢先生的原话,只是综合了他的意思。特此说明。

[2] 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3—24页。佐哈尔的观点转引自该书。

目 录

序	陈思和 1
---------	-------

上编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专论

导 论	3
-----------	---

附录一：1949 年以前涉及晚清域外文学译介的中国文学史	15
------------------------------------	----

附录二：1949 年以后涉及晚清域外文学译介的学术专著	16
-----------------------------------	----

第一章 译介观念	20
----------------	----

第一节 译介观念的发生与实践	20
----------------------	----

——以梁启超《新小说》杂志为核心	20
------------------------	----

第二节 不只是“政治”	31
-------------------	----

——晚清后期译介观念的嬗变	31
---------------------	----

第二章 译作类型	48
----------------	----

第一节 题材主题类型	49
------------------	----

——晚清小说期刊译作呈现的“显性”方式	49
---------------------------	----

附表一：晚清五种主要小说期刊译作题材主题类型	55
------------------------------	----

第二节 语言体式类型

——晚清小说期刊译作呈现的“隐性”方式 61

附表二：晚清五种主要小说期刊译作语言体式类型 70

第三章 译入文体 79

第一节 白话译作的“译入文体” 81

第二节 文言译作的“译入文体” 95

附表：晚清短篇小说译作集 113

第四章 译介方式 118

第一节 白话译作的“演述”译介方式 119

第二节 文言译作的“译述”译介方式 139

第五章 译介策略 163

第一节 小说译介的读者关怀

——启蒙立场与消闲趣味 163

第二节 “译入语文化”参与译介的方式

——“读者关怀”在译作中的具体实践过程分析 175

第三节 晚清小说期刊译介的“文学翻译观”

——“戏谑的重写” 185

第六章 创作与译作 197

第一节 域外小说译介与晚清小说期刊的“短篇小说” 197

第二节 长篇小说创作与译作之关联	212
第三节 第二种角度	
——文言和白话	221
余 论 晚清小说期刊译作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上的几点启示	
.....	226
附 伊索寓言译作个案研究	234
 下编 晚清域外小说译介研究资料	
一 晚清五种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资料	297
二 晚清域外小说译作编年目录	408
参考文献	506
后 记	515

上 编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专论

导 论

1909年,《扬子江小说报》上载道:

著述如云,翻译如雾。科学更加之侦探,事迹翻新;章回而副以传奇,体裁益富。……是以《新小说报》倡始于横滨,《绣像小说》发生于沪浚,……畴料才华遭忌,遂令先后销声,……况复《新新小说》发行未满全年,《小说月报》出版仅终貳号,《新世界小说报》为词穷而匿影,《小说世界日报》因易主而停刊,《七日小说》久息蝉鸣,《小说世界》徒留鸿印。……虽《月月小说》重张旗鼓于前秋,《小说林报》独写牢骚于此日,而势力究莫能膨胀。^[1]

晚清十年间,小说期刊就是这样略带悲壮地前仆后继,从而成为单行本之外译介域外小说的另一重要渠道,仅当时五种主要的小说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刊载译作就达百余部(篇)。在中国翻译史上,晚清时期正处于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大规模译介域外文学的高潮之中。^[2]目前,晚清翻译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3]然而在整体上还远没有充分展开,^[4]研究者多将目光集中在梁启超、严复、

林纾等大家身上;而对晚清小说期刊译作的研究,更是此研究领域当中的薄弱的环节。^[5]樽本照雄在文章《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中强调说:“要知道翻译小说在文艺界占着什么地位,应该说明一下当时言论界的期刊发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清末小说常常先登刊于期刊,然后再出单行本。为了了解当时文艺界的具体情况,要看期刊上的作品。这是我重视期刊的理由。”^[6]

成书和文学期刊是晚清时期译介域外小说的两个主要渠道。作为译作主要媒介载体之一的小说期刊,是一种新兴的近代化、社会化的文学传播方式,是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为突出的文学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标志着文学传播方式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换。^[7]而晚清小说期刊译介,就是当时域外文学(小说)通过此一新兴媒介进入中国文化圈、与中国社会及普通读者发生接触的一种独特方式,期刊译作无论从数量还是风格来说,都是晚清翻译文学的一个基础性、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关于晚清十年小说期刊本身及其译介情况的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当中的《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一、二)是到目前为止最为详实、最为全面的资料汇编。根据这部资料集的辑录,晚清时期译介域外文学的小说期刊,除了本书将要重点探讨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五种代表性刊物外,尚有《竞立社小说月报》、《新小说丛》、《扬子江小说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世界》、《中外小说林》等。关于晚清期刊的总体情况,樽本照雄统计的图表《期刊的创刊数目和发行情况》、《杂志三角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本背景。他的结论

是,在期刊创刊数量上“19世纪前10年的极点是日俄战争后的1907、1908年”,“从清末到民初在上海创刊的还是占多数”。^[8]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期刊,绝大部分都创刊于上海,拥有比较相似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彼此交流影响的可能,而《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就处于晚清期刊发展最繁荣的时期。晚清时期在域外小说的传播流通上,期刊完全可以同单行本分庭抗礼。^[9]

晚清小说期刊译介的所有特点都同其载体——晚清期刊的性质分不开。总体而言,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晚清小说期刊译介具有很强的文学组织功能。对于小说期刊在晚清文学文化活动中的核心作用,陈平原说:

这无疑是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而且,大部分主要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这样,办什么样的小说杂志或为什么样的小说杂志写稿,不免蕴含着某种文学趣味。理论上,大家都标举“改良群治”,可各个杂志之间创作倾向还是颇有差异的。为了作家的发展,也为了杂志的生存,各小说杂志不免既要追随时代风尚,又得保存一点自己的特色。^[10]

这同样也是晚清小说期刊译介域外小说的文化语境。晚清时期,很多域外小说译作也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11]大部分小说期刊编者亦从事域外小说译介,如《新小说》的梁启超、《新新小说》的陈景韩(冷血)、《月月小说》的周桂笙、《小说林》的徐念慈(觉我)。同理,他们各不相同的编办刊物的宗旨、特色,不但会贯彻到各自的翻译行为中去,还会通过他们的组稿、审稿以及评校影响到其所编刊物的整体译介活动。这是晚清各种小说期刊能够将大量风格